

一代名医

刘禹锡

● 洛阳 李粵冀 王守勤 ●

唐代刘禹锡(772—842)不仅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哲学家,亦是一位颇有抱负的政治改革家及造诣深厚的书法家,同时也是一代名医。他生于洛阳,真可谓是一位多才多艺的“洛阳才子”了。

刘禹锡少年时就爱上了医学。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实践,他掌握了一套较为高明的医术,并在医学研究中作出了一定成就。这方面较为突出的是他在唐元和十三年(818)编著的《传信方》一书。此书共分两卷,收录了50多个医药方。因所记载的每个方子都是经他试用多次证明确有医效才收入的,故取书名为“传信”。该书所收处方,治疗范围很广,包括内科、外科、皮肤科、妇科、眼科、

口腔科等;还记载了痔漏、急救、综合疗法以及一些治虫咬、蛇伤的偏方和方法。刘禹锡所收录的这些处方、单方、验方等,来源甚广,博采众长;有的是他自己创制的,有的是平时在街头药摊上学来的,有的是到乡村行医时搜集来的,有的来自宫廷御医;甚至还有从僧人道士那里学来的偏方。特别值得称道的是:《传信方》中的方剂不光有可靠的医疗实践验证,而且方中所用的药物,都是价钱便宜、容易得到的,真正具有“廉”(药价廉)、“验”(药有效验)、“便”(药容易得到)三个特点。对于出身官僚家庭的刘禹锡来说,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

《传信方》医学价值极高,所以在唐代及后世都有较大影响;可惜原书到元代就已散失。但由于一些古医书如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》、《苏沈良方》、洪遵《集验方》等都收有一些《传信方》中的药方,就连我国古代最著名的药书、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以及日本的《医心方》、朝鲜的《东医宝鉴》等医药书中也都引用了《传信方》的内容,因而才使该书得以继续流传。解放后,遂由冯汉鏞先生整理编纂成《传信方集释》,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,以至今人能重睹这份祖国医药学宝库中的珍贵遗产。

着重阐明义理以期实现治平理想,走向儒学更新,形成声势浩大的理学;并由野进而上朝堂成为官学。即使在尊王攘夷的《春秋》学大昌,限制佛老,净化儒学的时候,昌期也仍然根据自己的理性思维,作出自己认为合乎实际的判断。有时纵笔一挥,不免要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最敏感的痛点。例如宋王朝开国后赵光义以皇弟继统而有赵普效“金滕”故事假造了一个所谓的“金匱之盟”,为光义继统找合法根据;然而虚假暴露,流言传播,宋室掩盖犹失不及。惟独这位龙昌期硬说“金滕”故事是周公捏造而指斥周公为大奸,这不啻明指“金匱之盟”是诈伪。昌期不单专非周公,而又指《六经》无“皇道”。无怪要招来以正统自居的儒学家的呵斥,认为离经叛道,罪不可道了。

嘉祐四年(公元1059),龙昌89岁,他把所著书100卷进献朝廷,仁宗诏两制审阅,以“昌期诡诞穿凿,指周公为大奸,不可以训,乞令益州毁弃所刻版本”。这时朝廷因文彦博力荐,已下令赐昌期五品服,绢百匹。翰林学士欧阳修、知制誥刘敞等纷起弹劾“昌期异端害道,当服少正卯之诛,不宜推奖”。于是成案撤销,追夺所赐,遣归,昌期

返家之后便含恨逝世。

龙昌期思想学术特色主要表现在:

一、他在熟悉儒学的基础上,不满足于只为经传作注释,而是要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,根据自己的理性思维,作出自己认为合乎实际的判断。他在晚年所撰的一系列著作,大都是论述有关历史、制度、礼俗、文化方面的。他对传统儒学,决不盲从轻信,而是富有批判和务实精神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在著录龙氏著作时说:“其学迂僻,专非周公。”我国历代封建王朝,把周、孔神化,极力尊崇,宋真宗时特立周公庙,赋予以圣王的高大形象,而龙昌期一介寒士、偏方小民,乃敢公然抵斥,这就必然要使维护封建统治利益的官僚学者难以容忍了。

二、龙昌期思想开阔,治学范围宽广,不拘守一家之说,这是他的又一显著特色。他虽遍注儒家群经,却不喜欢只作先儒的仆从,还别开生面,打破常规,以佛说解经。他擅长《易》学,具有哲学家的深厚素养,在对复杂而变动的宇宙和人生方面,能虚心体会、观其会通,以求综概全面。